

编者按:当我们谈论性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

在社会学家眼中,性是社会学的话题。近日,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与黄盈盈合著出版了《性之变——21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该书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数据揭示,在 21 世纪前 10 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史学家眼中,性也是文化史的话题。不久前,以“性史”为第二专业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出版了《性学五章》一书。这本书则是谈论性文化背后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向读者展示了几千年来人们对性的态度变迁。



《性之变——21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潘绥铭、黄盈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出版



《性学五章》,江晓原著,海豚出版社 2013 年 8 月出版

编辑荐书



弗朗西斯·亨利·泰勒(1903~1957),美国著名的博物馆管理者、艺术品收藏家和作家,执掌艺术收藏重镇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5 年,其间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博物馆理论。

本书是东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关于艺术收藏的通史性著作,它以宏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有趣的细节展现了西方世界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 19 世纪初期 2000 多年的艺术收藏的历史。书中,欧洲不同时代和国家的艺术收藏风尚和主要活动都得到了反映。

本书还是一部关于艺术观念的历史:试图展示的是珍贵藏品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欧洲不同民族的精神气质、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特征,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等,均在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艺术收藏的时尚、趣味和风气中得到了清晰有力的折射。

《艺术收藏的历史》,[美]弗朗西斯·亨利·泰勒著,秦传安译,北京大学 2013 年 8 月出版

提起周策纵,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他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这本 1960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影响甚广,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的里程碑式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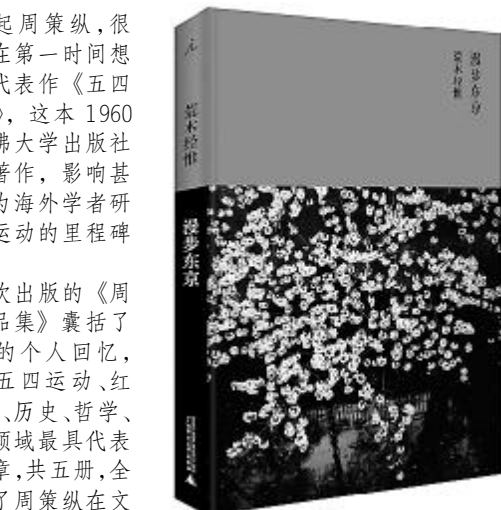
本次出版的《周策纵作品集》囊括了周策纵的个人回忆,及其在五四运动、红学、文学、历史、哲学、经学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共五册,全面展现了周策纵在文史杂哲方面的研究成果。

《周策纵作品集》,周策纵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年 11 月出版



《忆己怀人》、《文史杂谈》、《〈红楼梦〉大观》、《经典训诂》、《诗词与人》。

《周策纵作品集》,周策纵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年 11 月出版



荒土经惟,摄影师,当代艺术家。被称为日本国摄影家。欧美亦尊崇他为“Gran Maestro”(大巨匠),在国际上拥有相当高的评价。

本书依旧是荒土经惟漫步在他所深爱的城市——东京:他在途中邂逅了美女,重新体验令人怀念的昭和风情,以及未随着时代变化的孩童容颜;和偶遇的人们凝视、交谈的霎时,摄影机记录了进发于该时空的微妙情感;摩天大楼群形成的山谷之间、老街的巷弄里、山手线沿线住宅宅、墓地……

《漫步东京》,[日]荒土经惟著,阿夜译,广西师范大学 2013 年 10 月出版

本书以汪丁丁于北京大学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汇集多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及制度改革前景的思想成果。

本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并重点关注艾智仁、奈特与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作品和贡献。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汪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9 月出版

栏目主持:喜平



本书以汪丁丁于北京大学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汇集多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及制度改革前景的思想成果。

本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并重点关注艾智仁、奈特与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作品和贡献。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汪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9 月出版

栏目主持:喜平

21 世纪中国人性之变

■本报记者 朱子映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的潘绥铭是著名的性学家,有着“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与刘达临、李银河并称“性学三杰”,在大众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自 1988 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性社会学》《存在与荒谬》《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等 21 本近 200 万字的专著。

《性之变——21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下文简称《性之变》)一书呈现了 2000 年、2006 年与 2010 年三次进行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的针对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这 10 年的调查中,作者对中国人的性别关系、性生活、性心理等有了一定的思考,内容全面,蔚为大观,运用了最新的随机抽样和统计技术,超越了前人的《海蒂性学报告》及《金赛性学报告》。

性,不再是敌人

潘绥铭是一位处于舆论与伦理的风口浪尖似的人物。1985 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被首届学生斥为“脸皮厚”。从 1997 年起,他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进行入住考察,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等 6 本书;1985 年至 1989 年,每个夏天,潘绥铭都在日落之前,在城市的公园里观察,测定当众公开亲昵的异性伴侣的亲密度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场景,最后总结为一个数量化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1989~1990 年,潘绥铭还为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搞了《性生活与夫妻满意程度的关系调查》,等等。

2000 年,潘绥铭与合作者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会再见了),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调查覆盖了 18 岁至 61 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2006 年和 2010 年,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而且内容大幅增加。此外,他带领他的团队还进行了:对大学生、女性、流动人口等的性调查;对性产业、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研究;对同性恋、跨性别的调查研究;对某些性现象的研究,比如换妻、多伴侣、一夜情等。

通过多年的调查,潘绥铭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性观念的变化——性不再成为敌人。

“人们越来越把性当作一件私事。不再把它朝社会大目标啊,国家兴旺啊,民族啊等上面靠了。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前后,中国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再是革命式的,因为没有敌人了。”

在潘绥铭的性学调查中,他还观察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性本身的变化。“20 年前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得到的回答肯定是:男女床上事儿呗。现在得首先问,还是男女吗?不一定了。第二,是光床上事儿吗?也不一定了。所以,性本身也变了,不再只是异性之间,也不再只是唯生殖器官了。”

性,不再是生殖

纵观中国和西方的三次性革命(欧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都有一个共同的人口基础:短时间内青少年占人口的比例急剧上升。“二战”后,美国大兵回到美国生孩子,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中国在“文革”中,计划生育失效,8 亿人一下变成 12 亿,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这代人进入青春期。这么一大批青少年,他们的力量,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潘绥铭向记者介绍说。

而这代人进入婚姻后,恰好赶上自 1981 年起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性。独生子女政策打破了传统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禁止多生孩子,生完一个,国家不让再生。人们再过性生活的理由就只能是为了维系双方感情,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寻欢作乐。”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性,并赋予它新的意义和作用。不过,一旦承认或容忍性是为了快乐,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传统的道德言论不再有说服力。比如说,你凭什么反对早恋?凭什么反对婚外恋?你还凭什么反对同性恋?现在都没理由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中,女性的力量不容忽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性开放的中国女性没有显著地增加,那么男人的性开放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迅猛发展。”潘绥铭说。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

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而这 10 年也是女性意识包括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 10 年。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她们的觉醒,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和影响。”潘绥铭指出,“从性的角度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在性生活中,男女越来越平等。”

调查显示:在 2010 年的女性总体中,上年有过新增加的性伴侣的占 3.0%,上个月有过任何性伴侣的占 2.3%。为此,潘绥铭提出,21 世纪,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性,不再限于婚内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似乎只有婚姻中的人才会有性生活,但如今,无论婚姻有否,人们都可以拥有性生活。显然,婚姻已经包不住性了。

调查结果令潘绥铭印象深刻的是,虽然丈夫的婚外性一直远多于妻子,但两者的婚外性在短短的 10 年之内都翻了一番。另外,潘绥铭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婚外性的阶层差别正在日渐消失,正在走向全民化。

对于婚外恋,潘绥铭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大多数人看到了那些婚外恋,却很少注意很多夫妻在婚姻之内早就没有爱情,性生活也基本没有了。这本来是上个世纪的事儿,可是现在仍然存在。因为讨论第三者的问题,所以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住了。”他在调查中发现,反而是一些婚外恋,实际上感情成分多。“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冒着婚姻破灭的危险,冒着孩子将来骂他一辈子的危险,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你能说他不是恋情?实际上,每一个反对婚外情的人可以思考一下,你们婚内的恋情还有多少呢?”

不过,婚外恋在潘绥铭的调查中远非媒体报道的那么糟糕:在全中国 20~61 岁的结婚或同居的总人口里,越过婚姻而有性的人,只有 13.1%到 13.9%之间(正负差 0.34%)。“实际上,婚外性对婚姻的破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不过在这种冲击下,婚姻、爱、性三者的关系变了。爱和性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越是相爱的夫妻,性越和谐,性生活越多。性越好,双方之间的互相满意度越高。”

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

■本报记者 李芸

欲色彩的、不健康的,中国人几千年来性观念是如此吗?

江晓原:这其实是绝大的误解。从先秦时代到今天,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点点像完成了一个轮回。

在文明发展上,性规范逐渐产生和发展。上古之时,先民从野蛮状态过渡而来,性规范尚在若有若无之间。但是在华夏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流行的性观念一直是非常开放和富有“现代”色彩的。古代中国人重视人欲中的性欲。“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古训正反映了这一点。从先秦两汉直到隋唐盛世,古代中国人性观念坦荡且开放。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宋儒鼓吹的理论中就有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禁欲主义道学观念的推行,根本是反人性的,所以几百年来,就造成了中国人普遍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甚至嫖娼狎妓。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造成了那些病态的性观念。

《中国科学报》:你提出了一个“性张力”的概念,怎么理解?

江晓原:张力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比如一根悬吊着重物或两端受拉的绳子内部就有张力。而中国人的性心理,乃至整个民族的性心理都有类似的情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性长期存在着对

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和重人欲。另一极则是礼教。上古之时,先民从野蛮状态中进化而来,性张力几乎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性规范逐步确立,性张力开始产生。不过直到宋代以前,人欲一极一直很强而礼教很弱,性张力不强。自宋明之后,形成两极并强之势,性张力很大。而如何缓解这种性张力,求得身心平衡是无法回避的难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所承受的性张力已大大减弱。但在文明社会中,性张力永远不会减弱为零。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这 30 年中国人性观念的变化,在性张力大大减弱的今天,你个人感觉这个张力合适吗?

江晓原:我认为还是偏大了一点。要减少张力,绳子的两端就要更靠近。违反人性的那些主张,当然应该更向人性靠近。这样的趋势事实上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令人欣慰地持续着。

《中国科学报》:你曾给《性学观止》(第六版)写过一篇中文版序言,名曰“为什么我们会永远都会谈论性”,这个问题,你如何回答?

江晓原:首先,性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密切到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它的影响。其次,性学有横跨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特殊性。性学关于“科学知识”那部分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继续讨论的内容越来越少。但性学中的“文化”那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人们对于性的认识、人们的性观念和性心理,都在不断地变化着。而且许多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比如爱情的变迁、婚姻的价值,是永远难以定论的。这些都使得我们关于性的讨论和思考将一直持续下去。

至今还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在错误地引用贝特曼法则。贝特曼 1948 年在《遗传》杂志上发表论文声称,他的实验证明了雄性果蝇总是到处招蜂引蝶,而雌性果蝇则要矜持和慎重得多。贝特曼认为,两性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雄性可以产生大量微小、廉价的精子,而雌性只能产生少许大而珍贵的卵子,这使得前者到处寻找雌性果蝇交配,后者却必须保持慎重。用人类的眼光来看,雄性果蝇天生就是花花公子,雌性则可称为贞洁烈妇。

贝特曼法则在 30 多年后,就已经被证明不正确,生物科学根据基因技术发现,从竹节虫到黑猩猩,绝大多数雌性动物很难保持贞贞,而是会与尽可能多的同类雄性交配。这样做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为了生存,一些雌性动物获得了更多的食物;获得更多的受孕机会,如果交配次数、对象较少,雌性动物受精怀孕的几率会下降;尽可能避免新生动物被其他雄性动物吞食,后者将搞不清新生动物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上述结论是基于进化论的观点而提出的,绝大多数雌性动物在性行为上选择上的“放荡”风格归根结底是自然选择与生物体适应性的结果。人类中的女性,呈现出与之相反的特征,仍可归于自然选择与社会环境,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和夫妻相互遵守性道德的约束,更有利于于生存繁衍。

我们必须警惕在叙述和引用即便是最科学的结论时,通常采用的简化态度。简化、标签化是人们为了完成对复杂世界认知和理解的一种方式,却很可能省略复杂性,最后得到一套呆板无趣的理论术语。遗传变异和生殖繁衍(性行为)是生物体代代相传的根本方式,确保了生物体可以适应风险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环境——统一化的结论背后,是不同动物在生殖繁衍中的行为差异,而这种差异所引发的演化差别,才让今天这个世界呈现出物种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如果不懂得不同动物性行为的差异,不能从这些差异解读出演化规律,我们就无从采取有效措施去抑制人类活动对生态、物种多样性的破坏,人类很可能成为又一个时代的恐龙;曾经统治世界,突然被扫除出生存空间。

贝特曼法则尽管谬误,却为普及进化论、生物科学常识和理论知识的人们提供了重要启示:科普必须有其趣味。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让部分普及对象将注意力放在趣味而不是科学上,但比起呆板枯燥的知识灌输,可以让更多人接受科学而不是那些神神叨叨的伪科学。牛津大学博士、进化生物学家、伦敦帝国学院研究员奥利维娅·贾德森所著的《性别战争》,以其颠覆式的趣味写法,带给读者的将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捧腹大笑,还将普及各种不同动物的生殖繁衍知识,加深对进化论和生物科学的认同程度。那些总是在抱怨读者对科普作品不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好好研读一下《性别战争》。

在书中,动物们为自己遇到的性爱困扰向博士提出咨询,奥利维娅·贾德森用生物学知识和进化论观点为之分析作答。困扰各有不同,与蜂王交配的雄蜂必然死去;雄狮被雌狮的性欲折磨得筋疲力尽;雄性柄眼蝇每晚有成群的雌蝇排队等着交配却等不到“回头客”(也就不可能谈论什么爱情了);雄性海绵虱在他的后宫中发现了几个疑似“伪娘”(弱小的雄性动物通常会选择伪装为雌性,来骗过更强大的雄性对手,以获得生殖繁衍机会);雌螳螂与雄性交配时会咬掉对方的头;鲨鱼的交配过程充斥着撕咬等血淋淋的伤害;喜欢挑逗陌生雌性的雄性埋葬虫则要迎来“老婆”的家庭暴力……拟人化的设问,奥利维娅·贾德森在作答时也尽可能采用读者更易理解的拟人化叙述方式,这就是《性别战争》的笑点和独特性所在。

这本书取名为《性别战争》,可谓意味深长。从较为低级和简单的动物,到可归为较高等的动物,雄性和雌性都始终围绕生殖繁衍进行博弈,博弈在许多情况下是以残酷惨烈的方式出现,表现为决斗式的零和博弈;但也有间接通过演化变异来增强对环境 and 另一性的适应,进而在博弈中获得机会的方式。各种不同动物因此产生出千奇百怪的器官功能和性行为模式,吸引对方并给竞争对手找麻烦,还衍生出复杂程度不亚于人类社会关系的物种社会关系。

《性别战争》,[美]奥利维娅·贾德森著,杜然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8 月出版